山西档案
Shanxi Archives
ISSN 1005-9652,CN 14-1162/G2

《山西档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库恩科学史观视域下中国档案学科叙事演变:历史回顾与现实审视
作者：　闫静，陈坤
网络首发日期：　2023-11-08
引用格式：　闫静，陈坤．库恩科学史观视域下中国档案学科叙事演变:历史回顾与现实审视[J/OL]．山西档案. https://link.cnki.net/urlid/14.1162.G2.20231107.1533.006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网络首发时间：2023-11-08 08:54:00
网络首发地址：https://link.cnki.net/urlid/14.1162.G2.20231107.1533.006

库恩科学史观视域下中国档案学科叙事演变：历史回顾与现实审视*

闫静[1] 陈坤[2]

（1.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济南 250100；2.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深圳 518118）

摘 要：以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更名、中国档案学发展进入新阶段为背景，运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内史、外史以及库恩内外史结合的科学史观，从内部表现为理论问题、外部表现为学科建制出发，分别对中国（特色）档案学历史叙事呈现出的特点进行阶段性分析，对中国档案学的学科叙事以及其特色、话语是如何构建演变的进行讨论，总结出中国特色档案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走向独立、学科自省、学派自信。最终得出中国档案学科叙事演进规律：中国档案学在自我更迭的过程中，新的研究内容和领域不断出现，最终演变成了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建构了相对完备的学科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真正转变。

关键词：中国特色档案学；学科史；学科叙事；内史；外史

早在 2017 年，中共中央就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该文件精神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而构建三大体系，归根到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对于所有学科而言，要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又离不开对本学科历史叙事演进及规律的讨论与研究，即通过讲述“学科故事”深入了解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展望学科的未来图景。中国档案学作为学科体系之林中一门独立的学科，也理应以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为目标，讲好学科故事，在世界档案学界留下中国的学术印记。2022 年 9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档案学所属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正式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在此背景下，作为一门独立二级学科的档案学，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如何迎接机遇、应对挑战，就需要在“自省”中寻求“自立”的空间，而“自省”与“自立”离不开对学科史进程进行叙事学视角的检讨式梳理与反思。

学科史研究与叙事学的结合衍生出了“学科叙事”概念。根据莫娜·贝克的解释，“学科叙事”也叫“概念叙事”或“学科史叙事”，是为了适应某种需要，某领域的学者针对研究目标对自己或他人，就本学科的研究议题所做出的叙述或说明，而每个人也可以选择接受、传播或质疑该叙事[2]。在此理论下，各学科创立并阐述着各自的一套学科叙事体系，而这套叙事体系则源于学科发展的历史。因此“中国档案学是怎样发展的”成为研究中国档案学科叙事的核心议题。本文引入科学技术哲学的经典观点——内史与外史，以及内外史观争论下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史观，重新审思不同时期中国档案学科的建制化过程与特征，总结中国档案学科叙事演进的规律，为中国档案学科的“自述”或“他述”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档案学科的叙事演进与认同建构研究”（编号：23CTQ002）。

【作者简介】闫静（1989—），女，河北沧州人，汉族，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档案学史、档案学基础理论；陈坤（2001—），男，重庆人，汉族，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档案学专业，现为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项目工程师。

1 内史、外史与库恩科学史观

学科叙事是构建学科合法性与学科共同体的基础。西方国家的学科史研究多采用学科叙事视角，探讨学科的演进历程对学科认同的影响，而不同学者对学科史的叙事分析模式则稍显不同。在众多分析模式中，内外史论主导了百余年来的科学史研究传统，其中的内史论和外史论在各自的应用中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并拥有广泛的簇拥者。对于一名科学史研究者而言，进入研究之前都必须先做出这样的抉择：究竟选择内史还是外史？

1.1 内外史论的科学意涵

科学史的“内史（in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意指科学本身的内部发展史，研究焦点主要是学科本身发展的过程，涵盖贯穿不同年代的事件、成就、方法、论著、代表人物等方面。“内史论”强调科学史研究应只聚焦学科本身的独立发展，如学科思想理论的产生、科研方法模式的提出、学科框架体系的建立等。“内史论”学派的首位代表是亚历山大·柯瓦雷，其因著作《伽利略研究》而被公认为内史研究的开山鼻祖。全书的中心主题是：经典物理学起源于对落体定律和惯性定律的表述。该书集中展现了内史编史学的传统，指出科学的进步表现为概念的进化，自带着内在与自主的发展逻辑，伟大科学发现并非在于新事实的发现，而是在于新兴观念的诞生[3]。

而科学史的“外史（external history of science）”则指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影响的历史，注重研究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学科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外史论”强调科学史研究要更加关注文化、政治、经济等环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认为正是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了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研究科学史的首要方法应是将科学放到更复杂的背景中去考虑。罗伯特·金·默顿被誉为“外史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于 1938 年发表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被视为外史编史学的伟大成果。该书注重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十七世纪英国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并将英国科学在十七世纪迅速发展归因于当时清教伦理和英国工业的发展需要。较于柯瓦雷的“观念史”，默顿的研究不再从概念进化上考察科学进步，而是着眼于科学的外部。

自“外史论”提出以来，关于内史与外史两派的争论此消彼长。20 世纪 80 年代后，受科学自身演进、相邻学科与边缘科学的发展、后现代主义思潮等多重因素影响，科学史研究出现了由内史到外史的研究转向，内史论与外史论之争愈演愈烈。

1.2 库恩“内外史”结合说

审视两派纷争，内史论主张科学史研究和书写只应关注内部，而外史论则只研究其与社会的关系。从根本上看二者的区别在于把“科学”看成什么，一种是科学理论体，而另一种仅是社会现象。由此，内外史论只是研究同一问题的不同思路和视角，二者的研究对象相同。但用内史或外史的单一视角研究科学史是相对片面狭隘的，割裂了科学史的整体性。因此，在 20 世纪中后期，面对内外史之争论，一些学者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新观点，试图消除或取代传统的对立纷争，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史观便是其中一例。库恩作为一位历史主义科学史家，重新审视了科学史的编纂，分析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变化，从而提出了“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全新编纂模式。库恩将“科学史”分为科学内部史与外部史两个部分，内部史强调科学知识成长历程，外部史则将科学置于外部文化等背景中观察[4]。

库恩强调内外史相互补充，二者均为科学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理应既有内在逻辑又与社会密切相关。这种内外史结合的观点突破了以往局限于科学概念之内的有限研究视域，克服了单纯在科学逻辑内建构科学史的弱点，吸纳了两派优点。它既保留了学科本体的“内”，又兼顾了“外”领域的作用，这种思路几乎可以用来解释所有学科的发展历程。

用内外史论审视中国档案学，其“内史”又可以细分成“以范式理论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以人为中心”三种叙事方法；其“外史”又可以分成“以学科建制化为轴线”“以学科与时代互动为中心”两种叙事方法。鉴于中国档案学独特的发展历史，一方面，中国档案学史在某些时期缺乏具有代表性的

学者，研究不易展开，且易陷入学人个体思想述评的“模板式套路”，故在这里对“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模式不做讨论。另一方面，关于中国档案学是否形成理论范式这一问题，目前学界对此仍有争议：陈祖芬认为档案学已度过了前科学阶段，现已步入常规科学阶段后期，故得出中国档案学范式与科学共同体已建立的结论[5]；孙大东从库恩观点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出发进行分析，得出档案学范式尚未形成的结论[6]。故后文也不对“以范式为中心”进行讨论。

2 “内史”视角下的中国档案学理论体系

“内史”的重要表征为学科理论体系发展，涵盖贯穿不同年代的学术事件、成就、方法、论著、代表人物等方面。以中国档案学理论发展阶段为划分标准，本文将从觉醒独立、恢复发展、话语强化三个时期阐述中国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叙事演进。

2.1 觉醒独立期（20 世纪 30 年代～ 20 世纪 70 年代）

中国档案学正式创立于民国时期，彼时主要围绕行政效率运动和文书档案改革进行研究，重点关注历史档案整理和机关档案管理，并在相关领域产生了一批档案学论著，为中国现代档案学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但尚处于早期阶段的中国档案学仍以经验总结为主，这种“经验科学”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尚有差距，难以产生广泛的规范作用与影响[7]。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档案学逐渐拓宽其研究领域，以档案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为主题，对档案馆建设、档案的起源和产生、档案工作的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8]。新中国档案学肇始于对“苏联经验”的借鉴，在对苏联档案工作实践与理论、技术与方法批判性吸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国情档情发展出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科体系，其中文书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保护技术学、中国档案事业史、外国档案事业史等学科相继诞生，档案学的研究任务覆盖这些分支学科的不同方面[9]。1956 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鼓励全国各地各级档案部门大力开展档案科学研究。之后，档案学的分支领域得以不断扩展和完善。同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1956 ～ 1967 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以下简称“规划”）中把档案学列入十五个单列学科之一，明确提出研究档案学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与理论问题为目标。此规划对中国档案学建设与发展方向具有鲜明的指引作用，中国特色档案学因此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

出于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需要，此时中国档案学的基本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认清档案本质和特征的前提下，总结国内外档案管理经验，探索档案工作规律，提出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档案工作理论、原则和方法，服务于档案实践，促进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以此为基础，理论界围绕档案的形式、本质、作用，档案学的概念、性质与内容，档案工作的起源、历史、矛盾和规律，档案室工作与档案馆工作的内容及其关系，档案管理的环节与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对档案实践进行高度的理论抽象与概括，产生了《文书学》《中国档案史》《档案学基础》《档案学理论与历史》《档案管理学》《文件材料保护技术学》《档案管理法》《历史档案整理法》《档案学基础》《科技档案管理学》等一系列研究成果[10]。这些教科书作为原创性的著作，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体系与学科体系的基础部分。遗憾的是，接下来“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给正处于探索初期的中国档案学带来了一次沉重打击，中国档案学在这十年的寒冬中踽踽前行。

总体来看，中国档案学成立初期的理论研究以解决档案实际问题为主，应用性特征明显。在这一过程中档案学先驱们将档案工作的实践经验总结上升为系统抽象的理论学说，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基本认识。这一阶段取得的最大贡献是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档案学的指导思想，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档案工作实际紧密结合。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予以创建。

2.2 恢复发展期（20 世纪 70 年代～ 20 世纪 90 年代）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为契机，中国档案学的理论研究取得了新突破。20 世纪 80 年代，以服

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档案管理科学化为目标，中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扩展到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全宗问题、档案学科性质与学科体系、档案教育、档案开放、专门档案管理等方面。同时，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外档案学术交流开始建立，外国文件中心理论、档案全宗理论、档案鉴定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电子文件管理理论等逐渐在中国传播，为中国档案界带来了新的理论视域。这些理论极大地扩宽了中国档案学的研究议题，涉及到档案价值与作用、档案学研究方法、档案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档案法规建设、科技档案管理、档案管理现代化、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中外档案工作与档案学的比较等诸多重要议题。这些议题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档案学研究的重要内容[11]。

20世纪90年代，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不仅加深了中外档案工作与学术经验交流，拓宽了国内档案学研究视野，更是加速了中国档案学的开放化进程。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档案学的研究重心发生转变，研究者开始对中国档案学发展历程进行历史地、哲学地思辨，对中国档案学科体系及分支学科进行科学地、系统地重构。同时，他们还致力于将传统档案信息资源电子化和数字化开发利用起来，并及时批判性地引进外国档案理论。这些成为该时期的研究热点。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在档案部门中的应用，推动了档案学对电子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现代化的探讨[12]。

总而言之，这段时期中国特色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逐渐开始与学科自身发展需要及外部社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其学科独立性与延展性不断强化。中国档案学逐渐走向科学系统，学科体系基本成熟，实现了从零散化到体系化的转变。

2.3 话语强化期（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20世纪末，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档案管理的各个领域，档案学研究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和综合。为迎接机遇、应对挑战，中国档案学的学科话语体系在这一时期快速加强，并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电子文件管理兴起，成为中国特色档案学科体系的新分支。这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当属冯惠玲所撰博士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该文围绕电子文件相关问题开展了系统性探讨。冯惠玲领衔的亚洲团队还加入了“电子文件真实性永久保管国际研究项目（InterPARES）”，并就电子文件管理问题贡献了中国的学术智慧和研究成果。随着电子文件研究渐趋深入，这一议题迅速成为档案界的热门议题之一，其相关理论成果如电子文件管理制度、电子文件“单轨单套”实践、电子文件及其载体保存等研究成果纷涌而至。

第二，档案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愈发明显。其一，随着社会发展需要，档案学和同属一级学科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不断融合交叉，由此开拓出了新的研究领域，即学界所谓的“图情档一体化”趋势。其二，档案学并不满足于一级学科内部的跨学科研究，而是试图跨越一级学科范围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融合。这一时期已有不少学者运用非档案学的学科理论（如法学、哲学、历史学、人类社会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计算机科学）以及各种研究方法和技术，从不同方面和角度剖析档案学的不同侧面，档案学研究因此在横向与纵向都得到了拓展[13]。这种良性的交叉融合催生了档案价值论、档案文化论、档案信息论、档案法治论、档案和记忆、数字记忆、数字人文、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等一系列研究主题[14]。

第三，档案学深受信息技术影响而产生变革。档案作为数据的重要载体，受诸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影响颇深，这就使得档案工作模式、环境发生了变革，逐渐走向智能化、智慧化。由此促使档案学研究对象和档案学科体系再次拓展，诸如社交媒体档案管理、数字档案管理、数字档案馆、智慧档案馆、档案数据治理等议题成为研究前沿，备受档案学界和业界的关注。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档案学在不断变化中迅速成长，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研究议题不断丰富。至此，中国档案学整体上实现了由弱至强的转变，中国档案学科话语也不断强化。

3 “外史”视角下的中国档案学学科建制

“外史”的重要表征即学科化，而学科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建制化。学科建制化主要包括：从事

知识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组织机构，如以学科为院系划分标准的高校、研究所等；跨机构、地区、国家的学科共同体，如学会、联盟等；学科成果评价标准和学术平台，如期刊等；人才培养与管理制度，包括学位等级、课程设置等，如专业目录、学科目录、专业评价制度；学术水平评价、奖励和资源配置制度，如科研基金、学科评估制度等[15]。以学科化为划分标准，同样可将中国档案学学科建制分为觉醒独立、恢复发展、话语强化三个时期。

3.1 觉醒独立期（20 世纪 50 年代～20 世纪 70 年代）

中国档案学学科建制可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1952 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专修科档案班，1955 年在吴宝康的号召下历史档案系建立，自此中国档案学的教学层次由专科升级为本科。这标志着中国档案学学科建制的起始，以吴宝康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师生堪称中国特色档案学科初创的先锋队。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一批以教授和研究档案学为职业的中国档案学者群体逐渐形成。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巩固政权、百废待兴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他们刻苦钻研，开展档案学术研究，并以档案高等教育为依托培养人才，出版专业期刊，发表相关论著，提出了对中国档案事业及档案实践的基本看法，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档案理论和研究方法，使得中国档案学逐步受到关注并粗具规模，学术地位得以基本确立。虽然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已基本成型的档案学科建制，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人才培养机制、学者共同体、学术成果及学术平台，为改革开放后档案学的迅速恢复奠定了基础。

3.2 恢复发展期（20 世纪 70 年代末～20 世纪 90 年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国家与社会支持下，档案学科快速恢复。在随后的“六五”“七五”“八五”计划期间，国家档案局制定了档案学研究发展规划，为档案学科建设明确了方向。如“七五”计划明确要求：发展档案高等教育，把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办成我国高等学校档案教育与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每个大区选一所代表性大学，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档案学系。随着档案学在国内逐渐恢复，中国特色档案学学科建制呈现出两方面特征。一方面，更多高校加入档案教育与人才培养队伍中来，并形成了涵盖本硕博多层次的档案高等教育体系。从 1978 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正式恢复到 1995 年广西民族大学招收本科生，这一时期我国共有 26 所高校开办档案本科专业；从 1982 年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第一批档案学硕士研究生到 1995 年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招生档案学硕士研究生，共有 6 所高校获得档案学硕士招生资格；1993 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研究生[16]。另一方面，中国档案学术交流平台逐渐建立并呈扩大化之势。1980 年起，国内涌现出了一批档案研究团体、机构与学术期刊，其覆盖对象遍布全国档案部门和学术机构，为国内档案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和桥梁。如 1981 年在北京召开的被誉为“可以载入我国档案工作和档案学发展史册”的全国性档案盛会不仅正式宣布了中国档案学会的成立，从此中国档案学发展有了正规的全国规模的学术性组织机构，也预示着中国档案学在接续“文化大革命”之前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

3.3 话语强化期（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今）

这一阶段，中国档案学保持持续向上的发展势头，中国特色档案学学科建制呈现出多个特点。第一，1997 年起，我国档案学学科属性发生变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教育部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把档案学归类到“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这标志着档案学正式从历史学门类转入管理学门类，档案学因此有了管理学科的属性，课程体系建设也逐渐“管理学科化”。学科归属的调整为后期学位点建设提供了合法性的身份支持。

第二，人才培养制度进一步完善。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人才培养始终结合国情，服务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不断推出特色人才培养计划、改革教学模式、优化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颇有成效[17]。特别是在与数字记忆、数字人文、新文科建设的结合下，中国档案高等教育探索出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同时，得益于本硕博联合培养制项目，中外档案人才学术交流不断普及，进一步完善了中国档案学人才培养体系。

第三，学术交流平台与制度日趋成熟。国内交流方面，期刊、会议成为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数十

本档案学期刊逐渐形成了完善的投稿审稿制度，为前沿性的档案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园地。百余场高水平学术会议聚焦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为学界和业界搭建了交流的桥梁，取得了良好成效。国际交流方面，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共有 16 所高校信息学院成为 iSchools 联盟成员，国际档案理事会及其举办的国际档案大会出现了更多中国档案学者与档案学子的身影，中国档案声音在国际传扬。

4 中国档案学科叙事演进的规律

4.1 由“被动接受”走向“主动探索”

以内外史观照中国档案学的发展历程，这是一段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学科叙事旅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档案学得益于对苏联经验的学习、借鉴、吸收而得到第一次的发展。但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结合中国实际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档案学初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学科体系，学科意识开始觉醒。改革开放后，随着本土理论的渐趋成熟及对国外理论的吸收借鉴，中国档案学主动面向社会生活多重领域扩展，实现了学科研究视角的拓展与深化。

4.2 由“经验科学”走向“理论科学”

民国时期的档案学是文书整理工作的实践总结，并未表现出过多的理论抽象。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档案学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亦是尚未开垦的领域[18]，所形成的文字成果也多为工作经验的汇总，尚且谈不上“理论化”和“概念化”。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后半叶，在档案学基础科目的建设过程中，档案学者们围绕着一些基本问题，如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何、档案学的分支内容包含哪些方面开展论述。对这些问题的探索逐渐衍生出了中国档案学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加速了档案学向“理论科学”的转变。至今，中国档案学不再是总结实践经验的“经验科学”，而是具有原创性理论体系的“理论科学”。

4.3 由“立足本学科”走向“多学科兼容并蓄”

中国档案学自产生起即立足档案工作的基本问题，探索有关档案、档案管理、档案学的本源性概念、理论和方法。这也是中国档案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本，决定了中国档案学具有其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范式。随着学科体系的渐趋成熟，在“立足本学科”的同时，中国档案学也表现出了较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从学科创立初期与行政管理结合诞生了文书学，与化学物理结合诞生了档案保护技术学，与历史结合诞生了档案文献编纂学等；到改革开放后与法学、传播学、信息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结合，而催生出了一批新的研究方向和学科分支，中国档案学一直在交叉融合中完善其学科体系。

4.4 形而上、形而下的双重保障

中国档案学科发展离不开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支撑，也离不开形而下的学科建制保障。一方面，理论体系是学科存在和发展的核心与根本，彰显了学科的学理性及生命力。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是基于对学科基础问题、研究规范、逻辑范畴和知识体系的思考，是学科发展最终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学科建制是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为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保障。依托学科制度，档案学内在理论的组成要素、内在逻辑的系统阐释、学者群体的学术交流得以一一展现。中国档案学就是在理论建设和学科建制互相促进之下不断演进的。

5 结语

无论是从内史还是外史的学科叙事角度来看，中国档案学大体均经历了三个阶段：走向独立、学科自省、学派自信。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档案学在自我更迭的过程中，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领域不断出现，最终形成了独有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转变。中国特色档案学在初创、发展、繁荣的过程中，始终受国家政策和时代变革的影响，并在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建

设中自我革新，以适应时代需求。最关键的是，中国特色档案学始终如一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本立场，立足于并致力于解决中国档案学与档案工作发展的现实问题，逐渐形成了完善的中国特色档案学体系框架。面向未来，中国特色档案学仍应立足本土、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档案学的特色与风格，从历史性机遇中汲取力量，全面推进一流的档案学科建设。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新华社．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EB/OL].[2023-10-10]. https://www.gov.cn/xinwen/2017-05/16/content_5194467.htm.

[2][英]莫娜·贝克．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M]．赵文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8-59.

[3] 张斌，王逸凡．中国档案学学科结构的演进与发展[J]．档案学研究，2021(6):6-12.

[4] 夏莉．档案学科体系刍议[J]．湖北档案，2005(8):19-20.

[5] 陈祖芬．档案学范式的历史演进及未来发展[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68.

[6][15] 孙大东．中国档案学学术共同体研究——基于范式理论的分析[J]．兰台世界，2017(5):14-18.

[7] 吴宝康．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57.

[8] 张斌，杨文．论新时代中国特色档案学话语体系的构建[J]．档案学通讯，2019(5):4-12.

[9] 闫静．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档案学科的体系构想与学术反思[J]．兰台世界，2019(5):12-19.

[10] 宗培岭．改革开放与档案学理论研究[J]．上海档案，1998(6):26-27.

[11][14] 何明．“学科性学术”与“问题性学术”的张力及其消解——学术研究的建制化、去建制化和再建制化[J]．开放时代，2022(1):41-48.

[12] 蒋冠，桑毓域．关于全国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发展情况调查的统计与分析（上）[J]．档案学通讯，2010(1):69-72.

[13] 闫静．1949 年至 1966 年的中国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创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140.

[16] 张斌，杨文．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发展脉络与演进逻辑[J]．图书情报知识，2020(5):68-78.

[17] 尹鑫．中国特色档案学学科建设成果与发展路径探析[J]．档案学研究，2022(6):32-39.

[18] 冯惠玲，张斌，徐拥军，等．多学科视角下的档案学理论研究进展[C]．创新：档案与文化强国建设——2014 年档案事业发展研究报告集．中国档案学会，2014:6-66.

The Narrative Evolution of Chinese Archival Discip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uhn's Scientific Historical View: Historical Review and Realistic Examination

YAN Jing[1], CHEN Kun[2]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2. BYD Auto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Shenzhen 518118)

Abstract: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renaming of the first-level discipline of "library intelligence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into a new stage as background, the internal history and external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Kuhn's view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ombined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history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from the internal manifestation of theoretical issues and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disciplinary establishment, respectively.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is analyzed in stages, and the disciplinary narrative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and how its features and discourse have been constructed and evolved are discussed, concluding that archiv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generally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towards independence, disciplinary self-reflection, and school self-confidence. Finall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n the process of self-transformation, new research contents and fields have emerged, and finally evolved into a comprehensive disciplinary system, achieving a real transformation from nothing to something, from weakness to strength.

Keywords: Archiv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istory of science; Disciplinary Narratives; Internal history; External History